

【当代政治】

# 论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创新发

王献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时代特征、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等认识的深刻变化,我国意识形态实现了从管理型向建设型的全面转型。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转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左”和右的干扰问题,理论武装不力问题,错误思潮冲击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优化、价值理念转化、主导地位强化。

**关键词:**意识形态;全面转型;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5-0010-0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社会的深刻转型,我国意识形态也实现了全面转型。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克服当前意识形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在原有转型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一、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型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实现全面转型。所谓意识形态转型,就是指“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模式、‘党治国家’模式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变革甚至重塑”<sup>①</sup>。

对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学术界一般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限,把之前的意识形态称为革命型意识形态,把之后的意识形态称为建设型意识

形态。如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过程表现为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到建设型意识形态的转型。<sup>②</sup>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历史性转型。<sup>③</sup>

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转型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出现三种类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是典型的革命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革命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此时意识形态的建构主要围绕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如何才能夺取政权而展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第二阶段,意识形态是典型的管理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如何实现对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有效管理,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很快形成了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打破。因此,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不能

收稿日期:2020-01-03

作者简介:王献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2400),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处处长(郑州 450002)。

称为革命型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居高临下特征的管理型或管控型。另外,这一类型意识形态的特征是用革命的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客观上我国社会发展已经告别革命时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执政党的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中,用阶级斗争去思考很多不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第三阶段,是典型的建设型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改革”“发展”“建设”等词汇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话语,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实现根本转型。

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之所以实现转型,主要基于我们党对以下五个方面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新的判断。他指出,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增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5年,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sup>④</sup>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新论断。

第二,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从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作出严重错误的估计,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sup>⑤</sup>的不切实际的论断,导致20世纪6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左”倾化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十三大召开期间,邓小平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谈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合格,还不发达,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侧重阶级斗争理论到侧重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概而言之,“革命”和“建设”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表达的是革命主题,“发现新世界”表达的是建设主题。革命

时期,我们党重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夺取政权服务。新时期,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相适应,我们党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理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sup>⑥</sup>，“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sup>⑦</sup>。对马克思主义解释重点的变化,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第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注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到注重生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伟大理想,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我们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完全搞清楚。我们曾一度误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就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就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由此造成一些严重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十多年的思考与探索,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sup>⑧</sup>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相联系的还有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生产力标准理论等。

第五,对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的认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6月30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强调:“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sup>⑨</sup>这些论述表明,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从执政党的角度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胜利后执政党面临的全新任务。但在1957年下半年,党又重提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我们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些情况表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党的执政党意识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再次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标志着执政党意识越来越清醒。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认识发生的重大变化,新时期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等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认识、新论断、新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流话语发生了巨大变化,标志着我国意识形态实现全面转型。

## 二、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意识形态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转型过程也面临许多挑战和风险,不会一帆风顺。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必须两面作战:既不能“告别革命”,也不能“照旧革命”;既不能“非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再意识形态化”。具体地说,我们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历史观,坚持真理观决定价值观,又要充分肯定价值观在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突出作用;既要坚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党性原则,又要努力扩大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既要保持革命传统,又要致力于将这一传统有机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既要坚持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又要给自我实现预留足够的空间;既要坚持远大理想,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又要切实关注现实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等等。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被搞乱、被“妖魔化”,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sup>⑩</sup>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转

型是现代化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的统一。在现代化逻辑中,意识形态转型要涉及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等之间的转化或关系重建;在社会主义逻辑中,它要涉及革命与改革、阶级与阶层、斗争与和谐、计划与市场、劳动与资本等之间的转化或关系重建。<sup>⑪</sup>“两面作战”和“两个逻辑”的提法都表明,新时期我国要顺利实现意识形态全面转型,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处理好坚持真理和反对错误思想的关系等。否则,意识形态转型就会引发信仰迷失、思想混乱、道德滑坡等问题。

在充分肯定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意识形态转型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左”和右的干扰问题。一切“左”或右的错误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⑫</sup>时至今日,在思想认识领域,我们仍然面临来自“左”和右的干扰,特别是一些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那一套的右倾论调,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不小的冲击。

第二,理论武装不力问题。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中央还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就要求理论武装跟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感情上真诚认同、政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理论学习,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扭曲。例如,有的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党

的领导缺乏信任,推崇西方价值观;有的党员精神空虚,热衷于组织或参加封建迷信活动;有的党员身份意识淡化,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有的党员宗旨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有的党员道德行为不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乐、奢侈浪费。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力,也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三,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问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某些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反复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因此,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近些年来,国内一些错误思潮时有抬头,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如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加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证;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在解释我国意识形态转型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时,“转型陷阱”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面对。“‘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sup>⑬</sup>“混合型体制”的典型特征是权力和资本的奇异结合。借鉴“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学者认为,“转型陷阱”同样可以解释意识形

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型陷阱,就是将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某种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意识形态定型化,从而与畸形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不合理的利益结构相配套,甚至主动为之辩护。”<sup>⑭</sup>这种过渡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主义或成功主义。“这种成功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物质、现世的基础上,而不具备明确的超越性:我们不十分关注各种不能具象化的目标,无论是政治共同体的前途,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模式,还是个人的真正价值及生活的意义。”<sup>⑮</sup>经济主义或成功主义的核心精神是功利性和冲突性的。一方面,它缺乏足够的超越性,太过利益算计,无法消弭社会分歧;另一方面,它容易挑起人们之间的竞争与争夺,无法团结社会,反而撕裂社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在此意义上,能否有效破除意识形态转型陷阱,是新时期意识形态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 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的创新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sup>⑯</sup>新时代,要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时期已经实现意识形态全面转型的基础上,针对意识形态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优化、价值理念转化、主导地位强化。

第一,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优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理论的彻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跟时代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全面”“四个自信”“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话语表明,我们基本做到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确保了理论内容的真理性。但是,在理论体系的完善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创新发展。“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层次复合的思想观念体系,所有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内在关联的思想观念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并非一切这类思想观念直接就是意识形态。”<sup>⑰</sup>理论学说只有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指导思想,并体现在制度设计和政策主张中,经历一

个意识形态化过程,才能真正成为意识形态。例如,历史上儒学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新自由主义经过“华盛顿共识”后,才从理论学说转化为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实际上由价值理念、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组成。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关乎政治合法性,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不存在讨论空间;理论学说不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属于探索性的学术问题,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主张的不同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大家可以有不同观点。改革开放前,我国存在非常明显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左”倾),意识形态的三个层次高度重叠,具有集中性、单一性、排他性、教条性的特点,缺乏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这种“三合一”的结构,反倒经常使意识形态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状态。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的领域合一向现代化的领域分离转型,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结构也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的领域按自身特点与规律发展基础上保持统一性”<sup>⑬</sup>。但目前我国社会却存在另一种倾向,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实施违背学术道德、违犯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等同于探索性的学术问题(右倾),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理念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新时代要有效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就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三个层次的结构优化。

第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转化。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来自理论的彻底性,更重要的在于理论指导实践,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以其对现实生活的实际影响力赢得人心。理论指导实践的关键环节,是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转化为指导、规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和律法化的行为规范,也即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并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人生追求、价值准则以及相应的心理情感等,其实质就是理论武装问题。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理论武装不力,切实做到党性和人民性、先进性和平凡性的统一,使理论内容更接地气、理论话语更入人心,理论宣传更加有效,需要不断创新。二是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国家的法

律、法规、决定和命令,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使制度运行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sup>⑭</sup>。这不仅意味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贯穿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比如,有学者指出,应当对目前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进行完善,公司董事会应由股东董事、独立董事、工人董事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组成,监事会应由股东监事、工人监事两部分各占二分之一组成,以此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还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公司法》和《企业财务通则》中关于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只考虑了资本增值的需要”“根本没有考虑按劳分配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从法律上探索一条途径,解决劳动者如何分享‘剩余劳动’果实问题,以最终实现‘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的有机结合”<sup>⑮</sup>。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理念如果与具体的制度设计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就会极大损害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三是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礼节、仪式、风俗、习惯、传统,化民成俗,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正是在经历了“儒学制度化”和“儒学生活化”以后,才逐步实现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度融合,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转化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强化。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密切相关。面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私有化浪潮、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析评判,务必撕下各种错误思潮的温情面纱,揭露其本质。这些错误思潮无非是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目的在于移花接木、拆分嫁接、混淆视听、迷惑思想、制造情绪、丑化中国、搞乱中国、阻碍中国崛起、遏制中国发展。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理性客观地斗争、条分缕析地批驳,才能最终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sup>⑯</sup>。二是对由市场经济负面效

应产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但要严格区分合理利益追求与功利主义、美好生活需要与享乐主义、个人正当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的界限,防止把问题扩大化。三是“对于同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加强交流和学习,尤其要高度重视其在西方背景下通过引入现代西方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提出的真知灼见”<sup>②</sup>。四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后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社会思潮,则应通过核心价值观辐射和边沿价值观聚合双向互动,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所谓核心价值观辐射,是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到其他社会领域,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所谓边沿价值观聚合,是指将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中的某些合理内容逐渐吸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实现双向互动,核心价值观不断地改变并统摄着边沿价值观,边沿价值观也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核心价值观以一定的影响,使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丰富,兼容性更强,也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 注释

- ①②⑩⑪唐爱军:《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阐释——基于当代中国语境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7期。③胡海波、赵德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④⑥⑧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63、135、375页。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7—688页。⑩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⑬孙立平等:《“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⑮许振洲:《浅论意识形态及其在当下中国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⑰⑱韩源:《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党政论坛》2005年第8期。⑲⑳郭彦森:《建设和谐文化:文化整合的理性自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㉑刘须宽:《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及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㉒金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要求与创新路径》,《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浩 森 文 武

##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deology

Wang Xianfu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Marxism, socialism, and the position of our Party, the ideology of our country has realized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type to the construction type.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w period are: the interference of "left" and right,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mpact of erroneous thought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guide, continue to promot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concept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Key words:** ideology;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